

SHIYU
CHENGSHI

诗与诚实

公刘



花城出版社



诗与诚实

公 刘



花 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袁宝泉

装帧设计 马达礼

诗 与 诚 实

公 刘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7×1092毫米32开本 5.375印张 1插页 103,000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00册

书号 10261·253 定价 0.57元

目 录

自 序	1
民歌小议	4
诗与诚实	12
新的课题	22
诗的构思	30
诗与政治及其它	49
——答诗刊社问	
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	61
关于《刑场》	82
从“诗歌危机”谈起	92
阳关精神赞	97
我与唐诗	101
一点祝愿	126
诗的异化与复归	128

附 录

论题目的学问	139
解放思想与繁荣创作	147
也说“镜子”	162

自序

这是我有关诗歌评论文字的第二次结集，另一本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诗路跋涉》。其实，书名虽有不同，内容仍是跋涉。我想，只要一息尚存，跋涉势将继续下去。假如有人问我：什么是幸福？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跋涉就是幸福，工作就是幸福。当然，有一个前提条件：允许我跋涉、工作，给我跋涉、工作的自主权。我们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是英明果敢的，是党恢复了我的乃至许许多多同志的这种于革命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正当权利。意见说对了，总有些许好处，即便错了，或者不全面，那也可以引起人们的思索和争鸣，补充和纠正，最后达到相对真理的掌握。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可是，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居然恰恰害怕这一点；现在想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所谓跋涉，无非是一种追寻，一种探求，一种试验，一种奋斗，文学的各个门类和科学的各个门类一样，都应该大大倡导跋涉的精神，表彰跋涉的勇气；如果至今还有什么地

方，还有什么人老主意不改，坚持反对和阻挠这种追寻、探求、试验和奋斗，那么，完全有必要采取得力措施，结束这种背离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光彩的行径。平心而论，在实现四化大业的马拉松（几代人的马拉松啊）进军中，跋涉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辑录在这个小册子里的长短文章，除了校对中的错漏外，一律没有变动；我历来赞成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准确地说，我愿意让读者看到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作者的真实的带有某种局限性的凡人肉胎。

不过，需要郑重申明的是，《民歌小议》一文，在交给《山西群众文艺》发表时，却作了不少违心的增删。主持人反对我对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某些评价；力促我去掉应该善于鉴别和剔除文人创作的假民歌的主张；如果要谈诗的发展道路，就只许背诵流行的古典加民歌的公式，不能涉及外国诗歌的借鉴和吸收；同时，还指定我务必推崇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的那一首湖南民歌：《高山顶上有条渠》。这些，为了照顾情面，我基本上照办了。回忆起来，愧悔莫名。趁此出书的机会，我决心一一恢复原貌，也算是改正了自己丧失原则的错误，并向读者谢罪。

三篇附录中的为首者，《论题目的学问》，大概是全国第一篇针对《“歌德”与“缺德”》而发的批评文章；由于当时《安徽文学》的印刷周期长达五十天，待与读者见面时，早已落在王若望同志那篇著名的《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后面。然而，纵使这样，它对安徽全省文艺界的拨乱反正斗争，还是贡献了一

点微薄的助力。在省委的指导下，《安徽日报》曾经以头版头条的位置予以全文转载。这篇东西当时的作者署名是眉间尺，那是由于同一期刊物上登载了我的一首描写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颂诗《七公尺、一百二十公尺和四千公尺》的缘故。为刊物着想，我以为换一个名字是适宜的，并没有别的——例如害怕惹麻烦——考虑，合行说明如上。

1982年8月28日写于合肥

民 歌 小 议

为了促使人们重视民歌，进一步推动民歌的发展，《山西群众文艺》一次选刊了创作民歌一百首，这是一个创举，我相信，它将会得到所有在诗歌领域中有所思考有所探索的作者和读者的支持。编辑部嘱我发表一点意见，我得到了这么一个学习机会，当然是先读为快；这篇短文，就权当我的一份学习笔记吧。

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大决议，全力以赴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这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是我们诗歌创作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感情如果游离了这项任务，写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徒具躯壳。何况诗歌运动本身还有一个重大课题，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的继承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通过广泛的试验和长期的实践，从古典诗词，也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同时不断借鉴外国诗歌的成功经验，发展成为具有现代中国气派的新诗。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民歌的海洋；而在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古典诗歌又放射着特殊的光华。这两种历史现象并存数

千年，绝非偶然。可以说，任何一个真正为人民所喜爱的诗人，没有不吸饮民歌的乳汁的。这应该被认为是一条规律。而我们有幸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能凭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研究民歌，学习民歌，推陈出新，促进诗歌总体的繁荣，这是优胜于古人的条件，理应作出优胜于古人的成绩。

毋庸讳言，这一百首创作民歌，水平不一，但其中确不乏佳构；我以为，它们的强烈的思想艺术力量一定能感染读者，引起共鸣。

我们都经历过一九七六年那些大悲大喜的日子，亲身承受过这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因而当我们读到《两张日历两部书》的时候，就不能不唤起记忆犹新的第二次解放的欢乐。这首民歌以其春联式的有对仗而不雕琢的朴实文字表达了八亿人民的深沉感情。概括如此巨大的主题，仅仅用了四行三十个字。怎样使小小容器具有大大容量？这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

万恶的“四人帮”覆灭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已由新的党中央出色地继承下来，并正在不断推向新的高峰；万众欢呼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于是，言简意赅的《咱跟党走》和声情并茂的《俺的家》，就理所当然地感动着我们，一如发自我们的内心。

当前，全国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落实两个中央文件，学习湘乡经验，整顿干部作风，《大槐树上吊口钟》、《党的政策兑了现》等篇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迅速而准确的反

映，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人民公社广大社员欢天喜地的情绪，描写了为政策所调动起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如春潮，势不可遏，也触发了我们的思考：应该珍惜它，引导它，而绝不可再去挫伤它。《咱们的好干部》又与前者不同，它以通俗、明快、生动、泼辣的语言，为读者揭示了人民心目中好的基层干部的标准；既是赞扬，也是鞭策，既是希望，也是警戒，充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的气魄与感情，体现了党群鱼水关系这一光荣传统的无限生命力。《糖衣炮弹打不透》则教育我们：只要心不脱离群众，身不脱离劳动，资产阶级的糖弹就一定“打不透”革命者；而它的艺术表现方式却纯粹是农民式的，流露着庄户人的机智和幽默，读了它，简直就象在社员大会上听了一遍真诚而大胆的发言，使你能够在微笑中领悟到深刻的革命道理。与以上各篇相对照的，还有《就怕听你来开会》这样的新品种，它继承了我国固有的讽谏诗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打下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新的思想觉悟的烙印：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唯其尖锐辛辣，一针见血，它必将同样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上，人民自己拿起笔来，直抒自己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壮志豪情，放歌自己真实的而不是捏造的丰功伟绩，产生了许多好诗。收在这一百首中的作品，有相当数量都闪耀着新的光彩。而富有哲理意味的《知识源于积》，宛如铭文箴言，令人过目不忘。《前面还有“腊子口”》则巧妙地把新长征和当年的红军长征联系起来，号召我们继续奋进，夺取更大胜利，称得上是一张有鼓动力的诗传

单。至于儿歌体的《青蛙搬家住云头》和灯迷体的《丰》，也都富有情趣，别具一格。

出现了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总是令人高兴的。尽人皆知，十年来，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果园歉收了。许多“诗”不成其为诗，许多“民歌”也不成其为民歌了。这段时期的有关民歌创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还有待人们去认真加以总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叛徒江青便首先向民歌开刀，以她自己灵魂之肮脏，生活之糜烂，偏要扮成圣母模样，叫嚣民歌“低级”、“下流”、“情哥妹子”，企图扼杀民歌。后来，“四人帮”又出于其反革命政治的需要，他们改变策略，钻进诗歌内部来使之腐败变质，利用“诗歌”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直接插手某些文艺期刊和某些报纸副刊，干了大量的坏事，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四人帮”指使那个“诗报告”作者，假借诗歌学习样板戏的名义，贩卖“三突出”的黑货，实质上等于宣判新诗的死刑。不仅如此，在发生了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事件之后，他们象国民党反动派抓未成年的孩子顶替壮丁一样，又把儿歌驱赶上阵，使之在“批党内大儒”、“评《水浒》”、“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等一场接一场的反革命进攻中替他们充当炮灰。接下来更精心策划了一个声势烜赫的歪曲鲁迅、神化鲁迅的舆论攻势。我们知道，鲁迅明明说的是：“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又唱得出来。”作为这段诗论的前提的第一句，就点明了“内容”

问题，原话本来就包含着“内容的重要性固不待说，不言自明”的意思，这是任何一个稍有语文常识的人都明白的。但“四人帮”豢养的惯于偷梁换柱的论客们却装作不懂，或者装作没有看见，硬是撇开诗的灵魂——政治倾向、思想感情不谈，大做其形式至上的文章，居然还把鲁迅这一辩证统一的论点“归纳”为什么“顺口，有韵，易记，能唱”的所谓八字诀，欺骗了不少不知底蕴的青年。尤其恶毒的是，他们授意炮制了大量的“小靳庄诗歌”，公开盗用革命民歌的名义，狂呼乱喊他们自己一时还不便喊出来的种种反动口号，准备“迎接新天朝”。

由于“四人帮”长时期有组织有计划的腐蚀摧残，“恩威并用”，我们的民歌的确是外感内伤，中毒很深。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翻一翻当年的各地报刊，向江青递变相的诗体效忠信者有之，鼓吹“帮中央”种种倒行逆施的“战斗任务”者有之，讴歌反动口号“对着干”者有之，赞赏“四人帮”血腥镇压革命人民者有之，为“四人帮”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呐喊助威者有之，睁眼瞎说，把濒于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吹成“形势大好”者有之……无怪于有的同志曾经叹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有的同志曾经拍案：颠倒黑白，无耻之尤！真是：民歌。民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当然，写过这一类“作品”的，绝大多数都是受害者，并非帮派中人，他们和“既得利益”沾不上边。对这样的一些上当中毒的同志，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自觉消毒。

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对广大的作者、读者群众（包括

那些有糊涂观念的)进行一次再启蒙。我们有《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死不着》、《白兰花》、《回延安》等不少学习民歌大有成绩的好作品,可以作为范本。我们的报刊应当组织诗人或民歌手们写回忆录和心得体会,组织专家们写深入浅出的评论文章,从多方面普及民歌的基础知识,介绍成功的正确的实践经验。

其次,应当在观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民歌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歌。如所周知,从《古诗源》到《红旗歌谣》,古往今来的民歌大抵都是佚名作者居多。这说明,民歌确实来自民间。古有“采风”之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过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对于这次新民歌运动的成就与意义,周扬同志和已故的郭老作了全面的理论性的阐发。尽管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有一些论点还值得商榷,有若干教训还没有触及。

固然,由于工农兵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又较普遍地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更强的写作能力,署名的新民歌作品将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然而,今后是否还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征集工作并使之制度化呢?我想,还是有必要的,毕竟同时还存在着散佚于各地墙头,流传于人们口头的大量革命歌谣呵;而与之相反地,相当一部分所谓的民歌,不过是文人创作的赝品。所以,光靠铅字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定能算数的。

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代表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好作风。我

以为，民歌创作中也有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如同一切文艺形式的作品一样，我们的民歌也必须深刻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呼声，人民的经验，人民的利益，一句话，反映人心所向，反映历史前进的方向。只要我们坚持不说空话、大话、假话，不写“四人帮”卖力提倡过的强奸民意的“民歌”，那么，正如我们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一样，我们胸膛中唱出来的必然是为人民所公认的民歌。哪怕一时被封锁，但到头来是封锁不住的，人民会批准的。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歌不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么！

民歌要多样化，现在的创作民歌太单调了。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民歌是一种花；而在民歌这一品种中，这一朵与那一朵，又何尝不可以争奇斗妍？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以为民歌就是颂歌，或者只能写成颂歌；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以为凡民歌必四句二十八字，其实，历史的和实际生活中的民歌，四句头、五句头、六句头、八句头，“豆腐干”，长短句，什么形式没有？这次《山西群众文艺》选刊的一百首就有助于破除这些误解。还有一部分作者对革命的浪漫主义缺乏全面的、正确的理解，以为它仅仅是夸张，而且这种夸张几乎和吹牛皮没有区别。比如歌唱丰收，你形容一穗玉米要一架大车拉，我更了不起，要用一列火车拉。（这是漫画，而且是平庸的、缺乏真正的想象力的漫画！）这样的所谓夸张恰恰是社会上某些角落里的那股歪风侵袭民歌的曲折反映。它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政治的虚夸。我们的作者要抵制这股歪风，至少不要用自己的作品再去助长这股歪风。

此外，就是切莫滥用古典，随意堆砌大量典雅深奥的词语，混淆了民歌与七绝的区别，多少年来，我们从民歌中看到的“云水怒”、“风雷激”之类，正是这种消化不良的佐证。民歌贵在口语入诗。诗化了的（改造了的）口语，正是文学语言的新鲜血液。元好问说：“一语天然万古新”，的确是至理名言。

去年年底发表的毛主席写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其中三次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也提出了民歌问题和发展新体诗歌问题。形象思维是统领一切文学艺术的，也与世界观、方法论有关。没有了形象思维，就意味着文学艺术的灭亡。“四人帮”独霸文坛时期，某些民歌中出现的味同嚼蜡的现象，不正是抛弃了形象思维的恶果吗！要形象思维，就必得用比、兴。前几年，比、兴是犯禁的。有的编辑也不知比、兴为何物，特别是兴。一看见比、兴，就想入非非，甚至无限上纲，最后只好把大部分的比和全部的兴都“枪毙”了事，于是大家平安。这真是民歌的悲剧。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的灾难结束了，民歌的厄运也终止了，百花齐放的真正的春天来了。我们应当尊重艺术规律，运用形象思维，加速创造、发展新民歌和新诗的进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贡献全部心力。

1978年9月写于山西忻县

诗 与 诚 实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诗就与虚假发生了联系；到了林彪、“四人帮”当道，他们干脆提倡“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于是，流风所及，有的诗，成了押韵说谎的艺术。时至今日，“四人帮”已经粉碎两年多了，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好诗，但虚假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四人帮”的流毒诚然是既深又广且烈，万万低估不得，然而，它并不能解释一切。

天安门诗歌的读者以亿万计，新诗的读者又有几何？实在是对比悬殊！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确乎是多方面的，但最为广大读者反感的，莫过于我们报刊上发表的不少诗作不说真话，或者说，不替老百姓说话。当前，就整体而言，诗和电影一样，正面临着巨大而紧迫的信用危机。

伟大的“四五”运动孕育了伟大的天安门诗歌。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曾见的革命奇观。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天安门

诗歌乃是一个伟大的历史预言。为什么诗会成为预言？我想，最根本的还是它反映了我们时代最大的真实。因此，这里本来有一个极其深刻的启示，大可以振聋发聩，给我们的诗创作以强大的冲击。然而奇怪，我们的有些诗却象是包裹着一层厚厚的橡皮，非但推不动，而且弹回来，还在大唱老调子。

应该考虑得更多一点，目光不应该局限于诗。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诗的贫困反映了我们思想、精神生活的某种贫困，诗的虚伪反映了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某种虚伪。总结二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现在大多数人都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见解，即：妨碍我们实行政治民主和艺术民主，摧残包括诗歌在内的文艺百花的，主要的是封建意识形态，而不只是资本主义。

那么，以或明或暗的面貌，表露在诗创作（诗歌编辑工作也一样）中的封建意识形态，都是一些什么呢？略加剖析，恐怕是特权主义、门阀等级制度、人身依附观念、恩赐观点、闭关锁国论、小生产方式等等。这些坏东西，在先已见端倪，及至林彪、“四人帮”挟其高级顾问崛起之后，便越发地大见兴盛起来。如果有哪一位作者，居然敢歌颂除特定人物以外的任何一人，纵使这个人同样是人心所向、有口皆碑的伟大的共产党人和人民领袖，也会立即遭到棍棒交加的下场，不是说你“树碑立传”，就是说你“分裂党中央”。在林彪、“四人帮”看来，“朕即国家”，领袖不是一个集团，歌颂的对象超出了一个那就意味着权力的多元化，“多中心论”。他们利